

教育薪火书系·第一辑

理学大家周敦颐的 教育思想

孙先英 周 垚 饶益波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教育薪火书系·第一辑

理学大家周敦颐的 教育思想

孙先英 周 垚 饶益波◎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学大家周敦颐的教育思想/孙先英,周垚,饶益波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6
(教育薪火书系/张斌贤主编)
ISBN 978-7-203-10415-5

I. ①理… II. ①孙… ②周… ③饶… III. ①周敦颐(1017—1073)—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B40-092.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7905号

理学大家周敦颐的教育思想

著 者:孙先英 周 垚 饶益波
责任编辑:贾 娟
复 审:傅晓红
终 审:员荣亮
装帧设计:李尚斌 张国仁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mail: 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250千字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18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10415-5
定 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教育薪火 传承不息(总序)

钟秉林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直伴随人类的文明进程在不断发展进步,那些弥足珍贵的教育著作、教育思想、教育人物和事迹,无时无刻不在拨动着教育工作者的心弦。我们永远无法忘记那些给我们留下宝贵思想财富的教育家,他们的思想、言论和实践,依然是激励我们教育工作者前进的动力。时至今日,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更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深刻认识到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要想成长为教育家或者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起到扛鼎作用并非易事,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吸收过往教育家留下来的丰富教育营养,清晰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做到融会贯通,大胆实践,自成一家。与此同时,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普通教师同样迫切需要能够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得到启迪和突破的催化剂,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是经过检验的真理,是教学启迪催化剂的最佳选择。

然而,在浩瀚的书海中,以教育家为主线、囊括中外、跨越古今、自成体系的书系并没有面世。山西的《新课程》杂志社和《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在教育广袤园地上深耕多年,熟知一线教师的需求,希望为普通教师策划一套教育理论

普及读物,以使广大中小学教师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中外历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实践经验和办学理念,促进教育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实践。书系的策划人与张斌贤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夙愿不谋而合,合作编写一套大规模的、以教育家为主线的书系的想法随之形成。

策划团队把书系命名为“教育薪火”,是希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能够薪火相传,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教育薪火”书系拟分为三辑出版,按照中国古代、中国近现代、外国古代和外国近现代分类。第一辑共选择了100余位中外教育家,一位教育家一本书,规模宏大,应该说能够在中国教育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选教育家都是经过书系编委会认真研究、充分论证而定的,他们在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能够启迪或者感染教育工作者,推进教育和教学的发展。当然,其中有的教育家更为名声在外的不是在教育上,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贡献毫不逊色于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我们熟知的一些革命家;另外,还包括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家以及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的教育家。

必须提及的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顾明远教授、叶澜教授、史宁中教授、宋乃庆教授、田正平教授、裴娣娜教授和朱小蔓教授等担任书系的顾问,成立了由40位教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为书系的质量保驾护航。

还需提及的是,《新课程》杂志社和《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为物色学有专长的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书系的作者地域和院校分布广泛,既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的学者,也包括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等综合大学的教师。作者以教育史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为主力军,他们朝气蓬勃、时代感强,研究范围涉猎较广,能大胆地探索和怀疑,一些新的教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书系注入了难得的新鲜气息;他们与一线中青年教师同处一个频道,其思维模式很容易被接受。

客观而言,现在每年出版的教育类图书很多很多。一类为实践性强和操作性强的教学类图书,教师拿来就可以在课堂上使用;另一类为理论性强和学术性强的图书,印数少,流通范围小,普通教师往往望而却步。然而,教育理论只有指导教育实践才有存在的价值。在我看来,书系最具特色的价值就是秉承了教育理论通俗化这一理念,在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普通教师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书系以教育家为主线,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并重,用通俗化的语言,或阐述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精华,或叙写教育家的精彩教育事迹和教育实践,力图“润物细无声”,让教师喜欢读,在读中提高素养,深刻理解教育家,形成自己的理论,推进“教育家办学”。

当然,书系在真实性上也颇下功夫。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叙述,客观全面评价,不有意拔高教育家的贡献,注重教育家闪光点的挖掘和传播,是教育家历史画卷现代版的呈现。书系成规模、系统化,学术性和可读性强,具有较强的收藏价值,非常适合各中小学图书室和大学图书馆选择配置。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为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好事,张斌贤理事长请我作序,我觉得理应支持,欣然应允。

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能够认真阅读这套图书,为自己的教育职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为成长为新时期的教育家而不懈努力。

丁酉年正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

前言

周敦颐(1017—1073),本名周敦实,又名周元皓,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位居“北宋五子”之首,其他四位分别是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等,晚年定居庐山,为纪念故乡而命名居所旁溪水为濂溪,并名其居所为濂溪书堂,故而后世尊称其为“濂溪先生”。

周敦颐幼年丧父,投奔舅父——当时的龙图阁学士郑向,因聪慧仁孝,深得郑向喜爱。在郑向家居住的这段时间,周敦颐努力学习,参经悟道,为他之后学术水平的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舅舅郑向的帮助下,周敦颐得到朝廷的恩荫,当上了将作监的主簿,开始了他的仕途。

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周敦颐随迁润州丹徒县,不久,母亲、舅舅相继去世,周敦颐安葬母亲之后,便在润州鹤林寺守丧,在此期间得到范仲淹的指导。三年守丧期满之后,周敦颐出任洪州分宁县主簿,仕途一直比较顺利。

周敦颐无论在何地做官都非常重视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在公务之余,周敦颐将很多的精力放在了开办学校、培养人才方面,其中最有影响力并一直传为佳话的就是培养了号称北宋理学宗师的二程——程颐和程颢。周敦颐作为二程的老师,对二程的哲学观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后,二程又培养出朱熹等赫赫有名的门人弟子,奠定了宋代理学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宋代理学发展源于周敦颐。

嘉祐五年(1060)六月,周敦颐从合州回京,正好遇上了倾慕已久的王安石,两人促膝长谈、相互交流思想,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启悟。嘉祐六年(1061),周敦颐升为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在赴任途中,周敦颐应好友潘兴嗣邀在庐山游玩,对庐山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熙宁五年(1072),周敦颐在不幸

染上瘴疠后萌生了归隐之心,他辞官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次年六月,周敦颐病死于庐山濂溪书堂,终年 57 岁。

周敦颐教育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其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兴办学校,培养、选拔人才的方式对于当下的中小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周敦颐在师道观方面对教师的标准、教师的职责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并对教师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思想对于当下教师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提升自我,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此外,周敦颐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和途径也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提出的“立人极”的德育目标,与当下提倡的素质教育非常契合。同时,他提倡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三境界对于提升当前教育的水平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在教育理论上的建树之外,周敦颐在教育方法方面的思想对于广大师生来说则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总结的立志于学、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日积月累、务实慎动、观察体悟等教育方法在当下教育实践过程中仍然行之有效。

总而言之,周敦颐在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多实践,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教育思想是基于一次次的教育实践得来的宝贵经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了解古代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在指导当下的教育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通过众多文献的梳理,对周敦颐的师道观、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所使用的教材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为了探讨周敦颐的教育成果,本书对周敦颐的弟子及其濂溪学派的学术特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通过对史料的抽丝剥茧,期望以此还原周敦颐教育思想的全貌。

古代的历史、制度纷繁复杂,难以完全掌握,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也往往过于专业,不容易读懂。限于本书之受众,也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笔者在书中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制度以及教育常识等方面也进行了口语化的阐述,同时在书中穿插运用古代历史中的趣味故事,以起到普及知识、吸引读者的作用。当然,由于笔者学识有限,书中也难免存在错误之处,希望广大读者能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于将来改正。

孙先英

目 录

第一章 周敦颐的师道观	1
第一节 师道的内容	3
第二节 师道的实施	27
第三节 师道的意义	41
第二章 周敦颐的教育目标	53
第一节 “立人极”的德育目标	55
第二节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三境界	72
第三节 “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标准	83
第三章 周敦颐的教育方法	95
第一节 立志于学	97
第二节 惩忿窒欲	99
第三节 迁善改过	103

第四节	日积月累	106
第五节	务实慎动	109
第六节	观察体悟	116
第四章	周敦颐讲学中所用的教材及其讲题	119
第一节	宋代书院讲学之风的兴起	120
第二节	周敦颐讲授的教材及其讲题	124
第三节	周敦颐讲学中的著名议题	147
第五章	周敦颐的高徒、好友及其濂溪学派	155
第一节	周敦颐的师承	156
第二节	周敦颐的入室弟子	161
第三节	周敦颐的学术好友	176
第四节	周敦颐的主要思想及其创立的濂溪学派	184
	参考文献	203

第一章

周敦颐的师道观



周敦颐像

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历史文化中,“师道”是这座文化花园里一朵散发着扑鼻幽香的鲜花。早在夏、商、周时期,“师”字就已出现,在甲骨文中“文”“师”的字样。“师”字有多种含义,其中有老师、学习的意思,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代韩愈的《师说》中提到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其意思是说阴阳的交合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南宋朱熹把《中庸》中的“率性之谓道”的“道”字解释为:“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这样看来,所谓“师道”,就是指教师应该走的道路。事实上,“师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师道”是指实行教育的理念和规律,它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作用、教育意义、教育内容、教育原则等。而狭义的“师道”,则是指作为老师的原则、规律和方法,它包括怎么做老师、怎么教育学生等。

中国的师道观源远流长,它对社会尊师重教之风尚的形成、教育教学体系的优化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师道”的首倡者是开儒学之先、立道统之端的圣人孔子。几千年来,为了纪念他,传播他的学说,弘扬他的道德和精神,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孔子庙。这些孔子庙简称孔庙,又称文圣庙,简称文庙。少年儿童入校读书,第一件事就是拜孔子像。学校里每有大型活动,第一项礼仪也是集体给孔子像鞠躬。

孔子及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讲,就像布帛菽粟那样,须臾不可离开。孔子之后又经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等人的不断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传统,这些“师道”被古代名儒们倡导和实践,并被当时广大为人师表的教师所向往和追求。而到了宋代,被后人誉为“宋明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在作品《通书·师第七》中提出了“师为天下善”的观点,这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就现在来看,他的师道观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去领略和体会。

第一节 师道的内容

一、为师标准

探讨师道的内容,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何为师,为师的标准是什么。在我国古代周朝的时候,以教民之官为师,师即官师,亦师亦官。后来孔子创办私学,官、师分开,师成为专门的、职业的老师。再后来,在社会中,师便成为泛称,凡是那些人格、知识、经验有所长的人都可尊之为师。儒家经典《礼记·学记》记载:“能博喻然后能为师。”^①也就是说博学多识,然后才有资格做老师。周敦颐在继承了这些观点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通过对《通书》全面的考察,我们认为,在周敦颐看来,他更看重为师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修养,认为那些身有“德”者才能为师。

什么是“德”呢?按照周敦颐在《通书》中的说法“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所谓“德”,其实就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命题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讲,所谓“仁”就是要心怀怜悯之心,要关爱别人,要帮助那些处于困顿苦难中的人们。“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而且还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人们心中的道德理念。中国人讲求仁爱,时至今日我们仍称那些有德者为“仁人”,而批评无德者为“不仁”。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仁”与“人”“道”是统一的,它们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而仁爱之心人人都应该具有。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3页。

所谓“义”，简单来说，就是要有责任心，不仅对自己要有责任心，还要时刻以“义”来要求自己，而更重要的是在对待家庭、朋友、社会、国家时，也必须有“义”，让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义”。现在我们有时候批评某个人，经常说他“忘恩负义”，就是强调一个人必须有责任心。“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体现了社会性的人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在中华文化中，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周敦颐说的“义曰宜”，是合宜、应该的意思。他认为“义”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义”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比如我们经常说的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词严等。另外，“仁”“义”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民族道德精神，我们往往将二者并用，如仁义道德、仁至义尽、假仁假义、舍生取义等。

“礼”，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礼是会意字，它的繁体为“禮”，从示，从豊。豊字从豆，象形，古代祭祀用的器，用于事神就叫“礼”。所以，“礼”最初的意思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引申到日常生活中，“礼”就要求我们尊重别人，“礼”也就成为人与人交往之间的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所以《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精神，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制度文化层面讲，“礼”是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旧时的“礼制”和“礼教”有很多都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了，我们应当摒弃；从精神文化层面讲，孔子说“内仁外礼”，他认为“礼”与“仁”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互为表里，内心仁心爱人，行为体现出恭敬辞让，这就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也就成了“礼仪之邦”重要的传统美德。现在，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就包括“明礼诚信”，这里的“明礼”，从广义来说，就是我们上文所讲的“礼”所具有的丰富内容；从狭义上说，就是指待人接物的表现要文明、有礼貌。另外，我们经常讲的“礼节”“礼仪”等词语，不仅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且也被运用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这些行为规范都是提升人类道德修养和文明水平的途径，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

所谓“智”，指的是我们在处理事情、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有智慧。古人云“一叶落而知秋”就是智的体现。

所谓“信”，就是要有信用，要说到做到，对自己承诺过的事情负责到底。

当然,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命题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礼记·中庸》记载:“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仁,就是爱人,亲近自己的亲人最为重要,然后再亲及他人;义,就是处事得宜,尊敬贤者最为重要,然后再推及他人;亲近亲人有亲疏远近等级上的差别;尊敬贤者在德才禄位上也有尊卑高下的等级,这是由礼所生的。在这里,孔子将“礼”具体化和形式化,把它分为“仁”和“义”。“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

后来孟子在孔子“仁义礼”的基础上加入了“智”,构成“四德”或“四端”。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仁的本质就是侍奉父母;义的本质就是顺从兄长;智的本质就是要明白仁和义的道理而且不能背离它们;礼的本质就是要做到仁义,不失礼而且态度恭敬。再如孟子的“性善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③孟子在“性善说”中认为,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

后来西汉的董仲舒又将“信”纳入其中,并称仁义礼智信为“常道”,把它们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④

在这里,周敦颐继承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优良传统,更是将“仁义礼智信”解释为爱、宜、礼、通、守等概念,而且对“仁”和“义”还创造性地做出了一番详细的阐述,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9页。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3页。

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9页。

④班固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505页。

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①

《通书·圣学第二十》

在这里，周敦颐将“仁”在爱人的基本概念上增加了“无欲”的内容，所谓“无欲”就是没有私欲。周敦颐认为“仁”的外在表现为“爱人”，其内在表现则是“无私”。只有无私，才能要求从自己做起。而且在《通书·爱敬第十五》中说：“君子希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认为虚心好学，并博爱大众，则能“贵且尊”。这是圣人、君子应该具有的道德修养，也是为师者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肯定和尊重，也是由人心中发出，而施于人的。仁由心生，而不是由物生发，仁即无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从自己做起，要树立自己的主体人格意识。这也正是作为老师应该追求的职业品性。

“宜曰义”，按照周敦颐的理解，这里的“宜”是指人们行事要合于时宜、事理，也就是准确掌握行事的分寸。首先，在周敦颐看来，“义”是非常重要的，《通书·顺化第十一》中说：“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义”是圣人教化百姓的工具。其次，在他看来，“义”的外在表现是正直，其内核则是羞辱之心。因此，“义”作为“德”的一个内容、一项为师的标准，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周敦颐在《通书·道第六》中所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从上面我们看出，周敦颐的师道观继承了儒家的“五常”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不仅认为为师要有“德”，而且在端正对待“德”的态度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②

《通书·文辞第二十八》

①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1页。

②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页。

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①

《通书·富贵第三十三》

在《文辞》这一章中，周敦颐探讨了“文辞”和“道德”的关系，认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文辞不过是外在的形式，是传达“道”的凭借，而“德”才是实际、实在的。作为老师，必须要“学而至之”，才能教书育人，并认为现在社会的这种取舍失当，已经是久弊，如果要为人师表，就必须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周敦颐在这里探讨的“文辞”“道德”“富贵”等关系，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诸多相似。孔子的这句话是说：质朴多于文采，就像个乡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伪、浮夸。而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君子。孔子的这段话确切地说明了文与质的对立统一，文与质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只有恰当地处理文质关系，才能达到文质彬彬般理想的君子人格模式。

周敦颐在这里指出的“文辞”和“道德”的命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道德”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辞”则指文化的累积。文辞是重要的，如果没有了文辞，人们可能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是一些粗野、落后的原始人。但另一方面，“道德”才是人们本质的东西，“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如果太注重文辞而使其超越了本质的道德，就会如同孔子说的那样，显得浮夸和没根基。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道德”是指质朴的品质，“文辞”则是指文化的修养。那么，太注重文辞，就会让人过于文雅，显得像个酸秀才、书呆子，注重繁文缛节而不切实际。

从某种角度讲，周敦颐在这里提到的“道德”和“文辞”的关系，包括了写作、艺术、审美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内在美与外在美、质朴与文饰等诸多内容，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加以理解和发挥。比如南宋末年大词人张炎，张炎是宋词最后一位重要的词人，一般选宋词的书，选到最后，就得选张炎的，讲到最后，也得讲张炎。张炎在他的词中寄托了乡国衰亡之痛，备极苍凉。张炎精通音律，审音拈韵，细致入微，遣词造句，流丽清畅。在词的创作中，张炎主张“清空”

^①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页。